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基础探赜

谢 曦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南阳市, 473061; 766794359@qq.com)

摘要: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流派之一, 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性别领域, 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系统考察性别问题, 通过对私有制、家庭分工、非生产性劳动等概念的阐释, 在妇女受压迫的物质根源和解放路径根本问题上开辟了新的视角。同时,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始终保持着开放发展的理论品格, 在同激进女性主义等其他流派展开深入对话的过程中, 进行持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反思, 指出真正的妇女解放必须与消灭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相结。因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倡导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体系来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压迫; 女性解放

引言

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资本逻辑下的阶级压迫, 女性主义抨击父权结构之下的性别支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二者紧密结合, 以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共谋关系为切入点, 在剖析当前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异化、全球产业链中的性别剥削、家庭再生产劳动的隐形化等问题的过程中探寻妇女解放的现实通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解放事业置于全人类的解放进程中, 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 强调女性解放必须与劳动者解放相结合。此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为理论基础, 提出女性解放必须与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相结合。为了厘清妇女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 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 以此作为根本为全世界妇女解放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1.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性别问题的探索

尽管没有形成直接与性别相关的理论体系, 但女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女性问题的探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其思想脉络经历了从早期将性别问题与社会生产相联系来分析家庭结构的演变, 到中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再到最后系统阐明私有制如何导致母权制解体和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 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从现象观察向本质分析的深化。

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曾将犹太人问题简单宗教化观点, 他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必须以放弃犹太教为前提, 只有彻底否定宗教, 犹太人才能获得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尖锐的批判将社会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而忽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 并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任何特定群体的解放都必须与社会整体的解放联系起来, 这一概念直接指明了女性解放不能脱离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造。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 [1]”, 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区分形式平等与实质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 为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别压迫现象提供了关键的概念工具。虽然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雇佣劳动者的异化, 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这一理论延伸至家庭内部领域, 加深了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双重异化的理解。1845年,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 他们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时指出, 唯心主义哲学将现实的社会关系仅仅视为“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 完全忽视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性作用, 并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了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性别关系, 打破将女性困境归因于“道德堕落”的传统唯心主义论调。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 恩格斯开创性地考察了女性地位问题, 深刻揭示出性别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对立关系之一, 历史上最初的阶级对立就是与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同

步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与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2]。恩格斯考察人类社会从母系继承向父系继承的转变对性别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同时，恩格斯将家庭形态的变迁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相联系，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女性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刻分析，审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双重压迫：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将妇女和儿童异化为“最驯服、最廉价的劳动力商品”；另一方面，过长的劳动时间和极端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仅摧残着女性工人的身心健康，更对女性背后的家庭结构产生着严重影响，这一批判不仅清晰的呈现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更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性别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女性问题的分析突破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研究的局限，将性别压迫与更广泛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联系起来，为理解女性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2. 马克思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性别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必然会受到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制约。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生产资料由氏族共有，社会关系基于不同性别间的平等与合作，男女之间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分工，女性与男子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的性别平等是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社会协作的必然结果，随着农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性别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1. 物质基础导致分工性别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性别分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分工形式，家庭是最初的社会关系，两者密不可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2]，对通过对史前社会结构的考察，恩格斯阐述了基于生理差异的性别分工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分工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自然分工最初是不具有任何压迫性质的，只是原始社会生存所需要的必然产物，但性别分工并非天然不平等的，而是随着剩余产品、私有财产的出现，才逐渐被阶级关系重塑，从自然分工走向了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并由此形成一切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最初雏形。

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女性同时承担着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既是“食物的生产者”，又是“人的生产者”，两种生产在女性身上实现统一。同时，由于“人的生产”完全由女性承担，血缘关系按母系计算，形成母权制社会，氏族公共经济也保障了女性的社会主导地位，此时女性地位是历史的、具体的、被制度确认的，这一阶段性别分工是自然协作的结果，没有形成系统性压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畜牧业取得较快发展，男性在劳动中不仅为能家庭获取生产资料，还占有更多畜群、工具、奴隶等剩余产品，生产资料和奴隶逐渐变成“家长”的私产，男性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而曾经由女性主导的“人口再生产”与家务劳动被逐入“私人领域”，不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男性凭借其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将女性排斥出公共劳动，女性沦为家庭内的“生育工具”与“家务奴隶”，妇女日复一日被束缚在重复性家务劳动中，沦为家庭内部无偿劳动力，性别分工也从功能性异化为压迫性结构。

2.2. 私有制与家庭关系的演变

私有制的兴起直接引发了妇女地位的变化。私有制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变革，与剩余产品的产生、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家庭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其产生使原始社会中家庭与氏族的共生的关系被彻底割裂，把原本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庭结构改造成以父系财产为核心的经济单位，用“财产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当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成为社会主流，家庭的结构形态、财产分配便不再由自然血缘决定，而是与财产的归属权与继承权牢牢捆绑，催生出与私有制相适配的新型家庭秩序。私有财产制度的使原本具有公共属性的家务劳动转变为私人领域的非生产性活动，直接导致女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家庭逐渐成为男性支配和控制女性的地方，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被边缘化，沦为男性的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原因是因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和待遇都不如男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直接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难以享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家庭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单位，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不断演化的社会制度。随着农业与畜牧业取得快速发展，家庭这一最早的社会关系出现，分工的性别化也随之在家庭关系中显现出来。家庭的性别分工已不仅是技术分工，更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剩余产品的分配直接相关，女性的家务劳动变成只为丈夫、子女服务的私人劳动，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女性便也失去了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男性通过掌控剩余生产资料获得家庭决策权，母权制被推翻，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男性为了确保自己占有的“私有财产”被亲生子女所继承，需要确定血缘关系以将财产传给自己的亲生子女，要求女性保持贞洁。血缘

继承催生了父权专偶制（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妇女彻底被关进了“一夫一妻制的牢笼”，形成“男性统治、女性从属”的家庭结构，父权制与私有财产继承制度相互强化。这种男性主导的家庭分工在阶级社会中被异化为压迫性结构，但不同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样直接的、公开的阶级压迫，家庭中对于女性的压迫往往隐蔽于“亲情”之下，形成了以压迫女性为实质的“家庭奴隶制”，家庭奴隶制与私有制互为条件，构成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环节。

3. 马克思女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性别压迫与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在社会发展中相互交织，它们共同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女性地位的思考不是生硬的将“阶级”套在“性别”之上，也不是将女性置于资本经济逻辑之外，而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通过对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对生育力的私有化以及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隐蔽化，完成自身积累，从而滋养着父权制这一私有制形成的土壤。

3.1. 家务劳动是对女性剩余价值的剥削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是实质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超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然而，马克思的考察聚焦于社会生产中的剥削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领域——家庭内的无偿家务劳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延伸至家务劳动领域来揭示资本主义是如何夺取女性无偿劳动的剩余价值来维持其剥削体系的。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取决于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基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因而劳动力价值的持续再生产构成了资本得以剥削的重要条件。相比之下，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虽然只创造出没有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使用价值，但这些劳动成果构成了维持男性劳动力商品化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视角来看，家务劳动虽没有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通过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作为非市场化的隐性劳动环节，无偿家务劳动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潜在基础，并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工厂，更依赖家庭内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女性这种劳动力再生产具有二重性，一是日常再生产，女性通过膳食制备、居所清洁等在工资支付之外完成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日际修复，使资本家按“个体再生产”而不是“家庭再生产”支付工资；二是代际再生产，女性通过妊娠、分娩、社会化养育等生产出未来可供剥削的新劳动力，并将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成本外部化至家庭。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两重劳动被锁定于女性身上，并以“母爱”的意识形态掩盖其经济属性，从而形成独立于工资体系外的无偿价值机制。资本不断压低女性非生产性价值，扩张剩余价值，使女性沦为资本持续积累的隐性基础设施。由于女性承担免费的家庭再生产劳动，被排除在工资体系外，资本家得以用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购买男性雇佣劳动，一旦将女性无偿劳动显性化为市场化、社会化服务，劳动力价值必然上升，剩余价值成本增加，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必然产生结构性危机。

3.2. 私有制与父权制合谋实现对女性的双重压迫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性别分工、家庭关系以及女性权利的政治经济学解析，聚焦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到底植根于性别本身，还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一核心问题，最终将性别压迫形成的重要因素归结于父权制和私有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下的父权家长制，私有制下的经济结构导致了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进而形成了父权家长制下的性别压迫。母系氏族瓦解以后，女性处于一种受压迫的地位，父权制思想的压制使女性被视为她们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受丈夫的管教和支配，与社会仅有的联系要通过她的丈夫来取得 [3]。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妇女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自然而然被纳入其中。尽管这一变化打破了传统家庭模式，将女性的一部分私人劳动纳入到公共事务之中，为女性走出私人领域、参与社会生产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妇女的劳动价值得到了重新审视，但资本积累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过程，女性劳动力在其中仍然遭受着比男性更严重的剥削与伤害 [4]。资本主义大生产让更多女性回到生产领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社会女性的部分束缚，而现实却是她们既要在工厂承受低薪、高强度劳动，为资本家产出剩余价值，同时还要承担家庭中全部无偿家务，同时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之下。在生产领域，女性劳动力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女性因家庭责任只能被迫选择“灵活但低薪”的工作而资本视为“次要劳动者”，“贪婪的工作”几乎被男性垄断，导致女性职业发展的“玻璃天花板”，这种职场歧视使女性成为资本应对经济波动的“缓冲器”——经济繁荣时被吸纳，衰退时则被解雇，失业风险、贫困压力、家庭重担都迫使她们依赖男性工资，

阶级地位的脆弱性让她们难以抵抗性别压迫，进一步强化女性的“从属者”身份，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合谋对女性进行的双重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新的压迫形式。

4. 马克思恩格斯对女性解放路径的探索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5]。女性解放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议题，是与整个人类解放进程紧密相连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将女性解放置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思考，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6]”。

4.1. 生产资料公有：消灭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强化了性别间的不平等。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财产的继承始终把女性排除在外，由此取得了“男子对妇女的统治”的经济基础，要想真正实现妇女解放，首要的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瓦解“父权制”的根基，从而斩断“父权”与“财产”的联姻，从根本上消除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家务劳动被异化为“爱的劳役”，女性日复一日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却因这些劳动无法直接转化为市场价值而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体系之外，而公有制改革通过将土地、工厂、资本收归社会所有，彻底消除了男性凭借财产权获得的支配地位。19世纪20年代，苏联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实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纲领”。苏联集体农庄运动将89%的耕地收归国有，使农村妇女首次以与男性完全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产中。事实证明，当土地公有制取代封建所有制时，依附于土地私有制的家长制自然瓦解。

4.2. 妇女重返公共领域：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2]。要实现女性的解放，必然要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广大妇女才能进入公共劳动，从“劳动力后备军”变成“社会生产者”，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女性解除经济依附关系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私人的家务劳动转变为一种公共的行业”，妇女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第一，承认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体系，使家庭职能逐步被社会取代，把“育儿、保洁、养老”等劳动从“家庭义务”转为“公共产业”。第二，把男性纳入再生产劳动，让男性分担传统“女性劳动”，更有利于彻底打破“女性=照料者”的固化角色，从而让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打破劳动力后备军机制，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儿童集体抚育、公共食堂等社会服务，才能使妇女稳定地转化为社会生产者，而非周期性失业的“产业后备军”，才能真正实现女性从经济到人格的独立。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突破了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范畴，系统分析了家务劳动、生育劳动等传统理论未充分关注的领域，为19世纪以来的国际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7]，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仅彰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更指明了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内在统一，对于马克思所期待的“全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孙嘉笠.西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观 [J].学术交流，2019，(9).
- [4] 顾梦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联姻”及其可能——新世纪以来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态势及理论评价 [J]. 山东社会科学，2019，(11).
- [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6] 恩格斯.反杜林论 [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